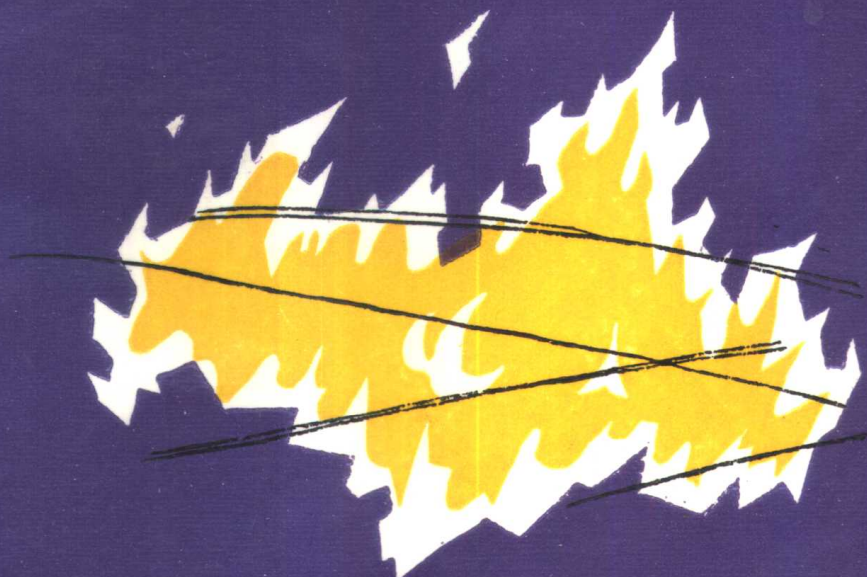


燃烧的荒地

路 翎 著





2 034 4178 4

02238

路 翎

燃烧的荒地

作家出版社



燃烧荒地

作者：路翎

责任编辑：朱荇青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周之骐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68千

版次：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33—8/I·32

统一书号：10248·0220

印数：0001—12,600册

定价：1.9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结构恢宏的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是献给 1986 国际和平年的作品。它立体交叉地写了中国、苏联、日本、美国四个国家中多个家庭几代人的沧桑。这里有远古的影子，有宇宙的回声，有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

作品采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将不同国度里的典型人物、情节和荒诞不经的故事交叉叠印，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检讨历史、匡正现今、设计未来的独特见解。

新版自序

路 翎

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在一九四八年写的。当时，曾由胡风介绍，在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版。

我是一九三七年开始写作，一九三八年到四川的。四十年代的一半以上在四川度过。我出身于一个旧时代的小职员的家庭，少年时期在黑暗中度过。我在那年代注意和接触到的人和事，虽然是很浅的，但淤积于我的心中。由于爱国思潮的影响，我憎恨罪恶的人物，而同情受着苦痛的、正直的人物。我在少年时一些年的夏天，曾随家人到我的家乡南京附近的乡村去看是小地主的亲戚，也就观察到一些乡村的地痞、兵痞和一些沉默的、生活困苦和遭遇着欺凌的农民。在南京的街头，也可以见到这一类生活困苦、受欺凌的人民，而在南京街头，和著名的夫子庙一类的地方，则常见到一些流氓、地痞、特务、兵痞——这也是旧时代的社会黑暗有着有毒的出浓血的溃伤的表现，也正是黑暗社会的出浓血的溃伤。那年代，我带着爱国的感情，对这些侵害着正直的人们

的恶毒的流氓们，注意着它们是贪官污吏的支柱和基础之一。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我从南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和渐渐更多地阅读起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和法捷耶夫等的影响，也由于生活环境，我增多注意社会的各类人物和增多地注意着下层社会。

进步的思潮影响着我。同时我也大量地阅读世界古典文学。我对文学的理解也从我的生活和我接触到的影响形成。少年的时候我较活跃，常在城市各处和城郊奔跑，观察人生；进步思潮和世界文学的影响使我这些观察得以为我的思想和文学活动所用：我渐渐地以文学写作为我的工作；我所处的环境里我未能接触到革命的关系，我便倾向于文学的努力了。我受高尔基与法捷耶夫等的影响而较多描写下层人民。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信》告诉人们以文学现实主义和指出描写人物是文学的主要杠杆，法捷耶夫的作品《毁灭》也崇尚描写人物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古典文学也同样地崇尚这。重要的文学作品展开了各类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不可动摇的道理。文学是以它所描写的人物，它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展开，它的艺术力量发生着作用的。理解社会的各样的人们的心理和内心世界，也就是增多了解人们的社会各联系与各因素。人们要推进社会，理解社会是重要的。旧时的社会上有着统治者的风习，控制着社会

的结构腐朽意识，也有着这些的异端和对立面——有时渐渐增多的对立面，但时常又是艰难的。因为希望探求社会的生活和各类人们性格的深处，因为希望打击黑暗和赞扬正义的事物，因为希望在时代的前进中尽自身的能力，因为希望记录下这一些时代的黑暗和人们的苦难，和社会的正与反的各类风习，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使将来的人们对这些时代有具体的理解，我学习着从事着文学的工作。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有时有着奋勇。我探求着正面人物，同时也探求着反面人物。在这部作品里，正面人物有着我那些年时常观察出感觉到的简单的忠厚又有其苦难，而反面人物是恶毒的猖獗的毒物，国民党黑暗的社会的溃烂的表现——黑暗社会的有毒的浓疮。但他们也受着渐进展的社会的一个的打击。在这部作品里，正面人物农民张少清和何秀英受着残酷欺凌，十分苦难，蒙受着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谋生的职业的关系，常住于乡村、矿区、码头。抗战以后我回到南京，回忆及所阅历的四川乡镇码头的社会，有所感想，有着一些主题和人物的形象的闪烁，便写了这部作品。

我的主题，沿着前面所说的线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恶毒的遗留，恶霸和他们的地痞的罪行，和农民的深受奴役和压迫。那时我回到南京生活还较安定，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着，使我觉得鼓舞，我便想着积极地探索、

揭发恶霸地主及其地痞、国民党兵痞的罪行，揭发他们的社会基础：反动的统治和严重的对人民的剥削。也揭发他们的内心的恶毒性。同时我想探索和理解农民的受压迫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忠厚的、正义的内心世界。我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的情况下，想到这些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对象之一的地主恶霸及其走狗兵痞流氓的恶毒；这些犯罪者们，有着恶毒的封建霸道，也有着现代的一些丑恶、狡猾的知识的武装。中国的封建倾向于崩解，但更恶毒挣扎，它在许多年来，在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与国际形势的压力下动摇着，但是恶毒的人物和丑恶的意识形态的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却增加了一些现代知识的装备，顽抗与继续行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仍然是大量的，虽然他们之中有着一些也在社会的进展下被击伤亡。这里我所写的反动人物郭子龙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中的小军官出身，当过特务，于抗战时期作为兵痞回到家乡农村码头来想要谋取地位、幸运、钱财，他和恶霸地主一起对农民张少清、何秀英，剥削再剥削，欺凌又再欺凌，但是，在各种恶毒势力的内部矛盾下，他混到了一些利益之后也灭亡了。也在农民张少清的对立的形势和一定的反抗下，他极端凶恶，有着那些年的流行于反动人物中的法西斯思想——但也极端颓废，作为恶霸的走狗他又幻想着自身的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精神有着崩解了。这兵痞死去了。

人民解放战争的时候我想，恶霸地主吴顺广和他们的走狗郭子龙这一类的人类的人民的敌人是不少的，他们历年来作恶多端，但他们是要灭亡的，他们作为依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不得人心，而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的他们的恶毒，历年来也使国民党政权失掉了人心。

我描写的张少清与何秀英是和恶霸地主及其走狗对立着的。糊涂、忠厚、落后和冻结的张少清受尽了迫害，他没有很多的反抗的力量。何秀英受到了侮辱，张少清与何秀英陷在痛苦中。吴顺广和郭子龙的残酷压榨张少清和侮辱他与何秀英，使他们遭到内心的烧灼的痛苦，终于张少清复仇了，张少清杀死了吴顺广，而国民党政权枪毙了他。何秀英从她的做工的地方到来，看着他的共患难的男人被人杀死了。

中国人民旧时的苦难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终止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写这作品，我怀念着一些困苦、不幸的农民男女，同时也是我向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提出的控诉；在我个人，也是我一些年的生活，希望黑暗终于溃灭的这一希望——那些怀着这一希望的日子所留的纪念。

当年，抗日战争停滞，人们在沉闷的失望中。在我那时所住的离重庆一百余里的一个叫做黄桷树的码头村镇里，一次一个我所认识的小的煤炭商人老头对我说：

“你在码头上昨日看见一个穿旧的皮甲克破皮鞋的人来到，见到你就扭过头去，他有些恨人，他是一个当了军队的营长的，‘剿’了共没有？不清楚，反正是个恶徒兵痞，行凶做恶的。他们这些人一发水过去了又一发水，一批人过去，一批人往上爬，欺人敛财，作了些恶，回到乡下来了，没有田地，回来是啃别人的田地。欺一两个乡农老实人，是原街北山坡上的吧。这一发水的兵痞的这种丑恶，比军阀时期挂枪回乡、失意回乡的不一样一点；有点时代不一样，多些知识了，聪明些。那一发水的军阀兵痞愚顽，恶臭多，这一发水的要刁滑机巧也恶臭多，你看是吧，几十年的光景变迁，也算是时势不一样吧。那年间见到农民，便一个耳光，这年代也还是一个耳光哟，不过多了些滑头话。当然，这类人的总量是少了些；是不是比较好些呢，也不见得好些。”后来我又碰见这有阅历的小的煤炭商老头，问他所说的那个兵痞的下落，他说：“啃到一个乡农，穷户，你见到过的，是他家的旧佃户，啃得很凶……也有人，大号地主取他为皂隶，也有排斥他。作了一些恶，抢掠一些……死了。这是又一辈子。这种兵痞子从码头归来了。”他叹息着说。

我大概记得他说的是这样。

我见到过这个煤炭商老头说的这个当过营长的兵痞。远远看见他在田地边走，凶恶地大声地辱骂欺压一个

在地里沉默地劳动着的农民，后来我听说他几次恶毒地打这农民。我以后看见这农民有些憔悴地在街上走过，眼睛睁得很大地只看着前面，显得十分凄苦。再一些日子，看见这农民被绳子捆着，由两个荷枪的“乡保队”的“国民兵”押着往江边过江往那边的北碚镇去了。当两个“乡保队”的“国民兵”押他到码头边的时候，曾听见他在绳子索里挣扎着而高呼着：一生正直，抗击欺压残害，报仇，不怕恶霸！（大意）后来知道，是杀死了残酷地欺凌他的恶霸地主。他是被押过江去枪毙，被杀害了。我总想赶去看未能成功。

我曾听到一个当长工的农民谈：过去军阀时光农民被铁丝穿着锁骨由当兵的拖着走，现在这少些了，农民见识也多些了，但是仍旧是有穿锁骨的，被绳子、也有用铁链子拖着走。许多人死了，象蚂蚁一般。过去农民插土为香，在地上叩个头，去与地霸仇人拚命；现在那些被枪毙的农民命运也差不多，他们老实一生，把仇恨埋在心里，临死时却发出伤惨的呼号。（大意）记忆这一点，也算是纪念。

我也见到过这被枪毙的农民的女人。她是从坡上下来，去追她的被人绑走男人的。几小时后我见她回来了，躺在坡上，哭着，但她也显出一种顽强，哭了一下静坐着，坐了很久，沉思着，后来站起来走掉了。

我零碎地回忆到这些——这部作品的一些材料的来

源。

从那以来，从四川重庆北碚嘉陵江畔这农民被枪毙被杀害，而他的女人在山坡上痛苦地呆坐着以来，四十几年过去了。我在一九四六年也离开那里，再没有去过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和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地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

我回顾过去，回顾我的这部作品，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是更显得很微小而有着粗糙的。

我十分感谢作家出版社愿意重排出版我的这部作品。

1987.5.26 北京

兴隆场是位置在嘉陵江北岸的高坡上的一个中等村镇。它的一条从码头一直通到山边笔直的石板路，是两年前才由当地最大的地主吴顺广经手翻修的，但已经被乡人们和苦力们的笨重的脚踏得高低不平了。靠近码头的一段，是一些肮脏的小饭店和客栈，各个门前的屋檐下挂着破烂了的红红绿绿的纸灯，经常地在大风里摇曳着，这些大风是从江面上和一里以外的一座峡谷里吹来的。普通的店铺、人家，那些因经常潮湿而发黑的破旧的门窗，那些变黄了的红纸门神，以及那些从人家的低矮的屋檐下显露出来的无数杂乱的东西，例如挂在墙上的成串的干萝卜，绕成很多圈的粗壮的绳索，穿成了一个圆球的枯烂的菜叶之类，构成了街道的后半段。但在石板路的尽头，小路向左边转弯而通向山野去的地方，紧靠着一座颓废了的贞节坊，却建筑着一座西式的两层楼的楼房。这是看来和街市守旧的愁苦的外貌完全不相称的。这是地主吴顺广的办事处，门上面挂着玻璃厂和

煤矿的办公室的牌子。这座房子，是乡人们在七年前亲手替他们的地主盖成的，那时候吴顺广兼着兴隆场的乡长，用乡公所的名义经营着玻璃厂和煤矿。乡人们不仅要出钱出力来替他造房子，还要替他的煤矿和玻璃厂纳税，所以，即使在兴隆场的最穷的人家里面，也能找得出几张吴顺广所发行的股票和“代谷租”的收据来。所谓代谷租，是用现钞来折合未来的田粮的意思。因为多少年来，兴隆场的田粮，以至于屠宰税码头捐之类都是由吴顺广家包去了的。因此人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吴顺广家的兴隆场，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吴顺广家的力量在内的事件，不能想象一件没有向吴顺广家申诉的冤仇，正如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得到吴顺广家赞同的希望一样。在看来还是单纯的风习里面，所有的人们，从流氓、小店主、小地主一直到船夫和苦力们，对吴顺广家的尊敬都是从感恩似的忠诚开始的——自然，这所谓尊敬原来也正是人们的自卫的方法。人们特别崇敬吴顺广的死去的父亲，觉得他是乐善好施的慈善的老人。地主少爷们的恶行，是被老头子的慈善的容貌挽救了，虽然这两者原来是一样的东西。

吴顺广现在四十几岁了，慢慢地从他的野蛮与锐利变得肥胖而和善。就是说，他已经懂得了他的父亲，感激着他，而对着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愉快的恶行做出悔恨的样子来。他捐了大批的钱给街后面的地藏庙，替所有

的菩萨塑了金身。他拿稀粥布施给服从他的穷人们，他并且施舍棺材。除了是煤矿和玻璃厂主人以外，他还是县参议员，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水利委员会和农田改进委员会的委员……他是这一片土地的确实的统治者。

一九四二年四月间的一天，一个瘦长、宽肩、姿态粗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提着一个很小的铺盖卷从码头上来，走进一家比较整齐的小客栈里，在他恶声恶气地要了洗脸水之后，就有码头上的两个闲荡的年轻流氓走到他面前来呆看着。他们注意地看着他脚上的一双满涂着烂泥的皮靴，看着他的半新的黄呢马裤，他的上身的一件磨损了的皮甲克，他的多骨的有力的大手——一直看到他的生着乱须的下巴和那一对有些朦胧的男性的刚强的眼睛。这种注意是由于小的地方所有的那种好奇心和排外的心理，这些小的社会，如果它们不能一下子就打倒外来的事物，它们就会吸收它，而使它成为于自己有利的存在。但正当这两个年轻流氓这样呆看着的时候，这奇特的客人从腰下解下一把左轮手枪来，轻轻地抛在床上。

“茶房，”他喊，“叫老板来！”

站在房门口的那两个年轻人显得很紧张。老板是一个很肥胖的老人，样子很痴呆很老实，显然他就是靠着这痴呆和老实的样子支持着这个客栈的。



“你是刘老板吧？”客人说，“我问你话。”

“是的，大爷！”

“你们场上的吴顺广，他这几年怎样？”

“他老人家还是那个样子啊！”

“吴大爷刚才还在码头上的。”两个青年中穿长衫的一个，带着集中的注意说。

客人对着他轻蔑地望着，使他羞恼得脸红起来。随即，这客人显出了一个讥嘲的笑容。

“小娃娃少开口，”他用着这乡土上的腔调说，“喂，老板，你认得郭子龙吧？”

“不认得啊！”老板不假思索地说。

“真的不认得郭子龙？后山坡上郭福泰的儿子，船老板郭元洪的堂兄。”

“郭福泰——他老人家过去好些年咯！”老板说，然后注意地看着这客人，在一阵突然的兴奋里沉默了。

“哈！”客人说。

“这些年……是做官，回来了吧？”老板谦卑地小声说。

短时间的寂静。客人冷笑着并且兴奋地扭响着他的多骨节的大手。

“刘老板，”终于他说，“你去跟吴顺广说，我的房钱、饭钱，都去跟他算！”

他命令老板出来，然后对那两个吃惊着的青年看了

一眼，关上了门。那两个青年流氓立刻就飞跑着，向吴顺广报告这一切去了。

郭子龙是他的父亲郭福泰的独生子，他们是兴隆场的中等地主。

他是一个狂妄、放荡、聪明而大胆的角色，这种角色，是由山地里面的强悍的风习，袍哥的英雄主义，以及几十年来的社会动荡培植起来的。在郭子龙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年以前，在全国规模内不断地进行着军阀的内战，崛起着现代的生活或趋向现代生活的要求，爆发着样式复杂的革命斗争。这些战争和斗争，在急进的地主少爷们眼里是以人事变化的样式而显现着的，唤醒了他们的投机而前进的欲望。直接地被郭子龙们感觉着的，是物质生活上面的变化。他们不再象前一代的好汉们似的用着恶狗的姿态守着家乡了，他们要求发展和出人头地，因为看起来在大动荡中发财、升官、带兵的机会是这样的多。在重庆念了几年新式的学校，年轻的郭子龙梦想着新的生活和享受，就彻底地厌恶了乡场上的单调生活。他把他的这一切欲望叫做理想，心里鼓动着庄严而热烈的感情。他的母亲对他不能做主，他的父亲又是以流氓手段起家的袍哥领袖，除了要求儿子成为和他一样的英雄好汉以外完全不知道别的，不给他一个钱，毒打他而且对他叫骂，要他“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母亲死后的一些年，老头子病了，衰颓了，变得虔敬起来，